

# 走进豫东 探究考古

## ——豫东考古又添新作

张国硕

赵俊杰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考古专业,跟随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前夏商周考古、豫东考古,擅长田野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工作,已发表多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近期,俊杰在教学之余对其博士论文又进行了修订,补充了一些资料,定名为《豫东地区史前夏商的社会变迁》,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著作付梓之际,俊杰请我为该书作序,我当然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我指导的学生中又有著作出版,更重要的是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豫东考古工作,亲自主持参与了多个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喜见豫东考古研究又有新成果问世。

“豫东地区”是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开封市、商丘市所辖的区域以及周口市所辖区域的东北部。所谓“豫东考古”,是指为了一定的学术目的,对豫东地区的史前及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的专门考古工作。广义的豫东考古,还应涉及豫北新乡地区东部、鲁西南菏泽地区以及皖北、苏北部分地区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豫东地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里是中国古代民族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交汇地带,更是夏族、商族、东夷族群文化交流、碰撞与对峙的主要场所。在研究夏商关系、商族起源、先秦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史等方面,豫东地区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事豫东考古与先秦史研究工作,对于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华夏民族的融合进程,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豫东考古与先秦史研究工作已经历了80余年的历史。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郑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商丘、开封、周口等地文博考古部门等诸多单位和学者的不懈努力,豫东考古与先秦史研究成就斐然,在商代文化发展序列和文化面貌的确认、夷夏商三族文化遗存辨析、商族起源探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毋庸讳言,豫东考古与先秦史研究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一些课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当前及今后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搞清楚豫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发展序列。这个地区已发现的裴李岗时代文化、西周时代文化、战国时代文化遗存并不丰富,无法全面把握其文化面貌与演变特性。目前,这一地区裴李岗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属于空白,只见有零星零星的调查资料。仰韶时代遗址的发掘主要局限于豫东西部,豫东东部有待做更多的工作。西周遗址只在周口地区的鹿邑有所发掘,但商丘地区、开封地区的西周考古工作仍然比较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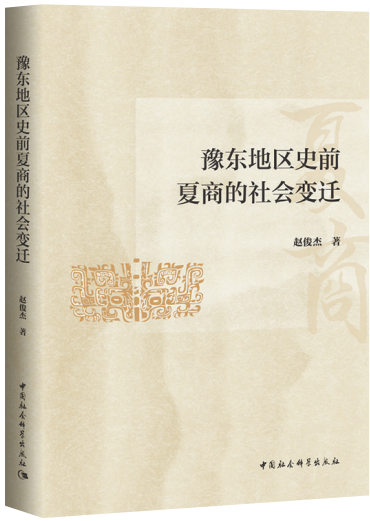
二是重点探讨先商文化、岳石文化乃至二里头文化在豫东地区较为精确的分布范围,存在年代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目前所知属于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东开封地区的东部(杞县)和商丘地区的西部(民权、睢县),柘城一带可能也有下七垣文化遗存,而豫东商丘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文献所说的“商亳”一带是否属于下七垣文化的分布区域需要进一步澄清。

三是要深入探讨豫东地区古代文化与豫北地区、鲁西南地区、皖北、苏北地区的相互关系。要用文化因素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豫东地区的文化源流、文化交流与融合进程,并深入探讨各族群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历史。

四是深入研究豫东地区古城、古国、古都,探讨古代的社会变迁进程。除了淮阳平粮台城址,在广大的豫东地区,目前甚少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代城址。文献记载夏王帝宁曾都“老丘”,老丘应在今开封境内,或在开封县陈留城之北,或称在今开封市东北,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勘察发掘工作加以确认。另外,在夏商王朝时期,今豫东地区分布有一些方国,如杞氏、斟戈氏、有虞氏、纶、有莘、葛、孟方等,在夏商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周时期豫东地区分封有宋、陈、杞、戴等诸侯,还建造有启封、栗等城邑,这些皆需要开展一定的考古工作。豫东及相邻地带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较低,地面泥沙淤积严重,古代遗存埋藏特点独特。这个区域的古代遗址多被掩埋在地下数米深处。一部分遗址位于岗地、垆堆之上,但后期居民活动对遗址破坏严重。研究该地区的文化遗存发展变化,系统分析地理环境的变迁、人地关系,全面分析该地区史前夏商周时期的社会变化和演变轨迹,当为豫东考古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豫东地区史前夏商的社会变迁》一书,以豫东地区的考古材料为基础,并与相邻地区以及其他相关考古学文化之中心分布区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史前夏商时期该地区居民的社会变迁,并结合文献记载分析背后社会发展动因。全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梳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介绍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第三部分分别对豫东地区史前时期、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考古学文化分布、分期与年代、性质等,重点分析文化序列、考古学文化关系和文化演变。第四、第五部分研究社会生产和生活问题,分析农业、饲养、渔猎与采集、饮食、陶器与铜器制作、建筑、埋葬习俗与祭祀等方面的文化面貌及其变迁。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分析社会进程发展的原因。

书中作者认为,史前夏商时期,豫东地区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与现今有所不同。史前时期地形整体为平原地貌,平原之上分布着诸多河沟、湖泊和沼泽,其间又有无数高高耸立的土丘,



气候环境由仰韶时期的温暖湿润向龙山时期的干凉转变。夏商时期地形、地貌变化不大,气候整体向较为干凉转变,但期间有所波动。

史前夏商时期豫东地区先后分布着多种考古学文化,文化关系分为五个时期,即裴李岗文化阶段的初期、仰韶文化阶段的形成期、大汶口文化和造律台文化阶段的发展期、二里头文化阶段的对峙期、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阶段的稳定期。裴李岗文化阶段,豫东地区开始有少量人类居住,是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文化交流的通道。仰韶文化阶段,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均有人类活动,成为中原大河村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江淮地区石山子文化争夺的重要区域,其中大河村文化对石山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汶口文化和造律台文化阶段,中原地区序列文化遗存和海岱地区序列文化遗存在此区域交错分布,人类活动频繁,文化遗存丰富,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对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二里头文化阶段,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在这一区域的西部相峙。中原人和东夷人均在此地设有重要据点,并长期对峙。下七垣文化南下到达该地区,与岳石文化友好共存,并最终西进灭夏。二里岗文化阶段,岳石文化继续在此区域延续,二里岗文化四期时二里岗文化开始进入该区域的西部,并在柘城孟庄建立重要军事据点,该遗址的性质可能与仲丁迁亳有关。商代后期,殷墟文化广泛分布于豫东地区,岳石文化被殷墟文化完全取代,该地区已经完全纳入商人的控制范围。当地居民与都城殷墟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人甚至迁往都城地区居住。

在社会生活方面,裴李岗文化时期,社会各个方面如粮食加工、陶器制作、农业生产等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农作物以粟为主。仰韶时代的大河村文化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种植粟、黍等作物。猪和狗已经家养,家猪饲养已经比较成熟,渔猎采集仍然较为发达。制陶、制骨等手工业相对中原腹地要落后,但埋葬习俗与中原地区高度一致。大汶口文化时期,部分遗址呈现出水旱混作的种植方式,野生动植物仍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食物来源,家猪是主要的肉食动物,见有扬子鳄等稀有动物。这个时期形成蒙城尉迟寺中心聚落,建筑技术等方面较为先进,重视聚落规划。有独特的埋葬习俗,重视儿童埋葬和自然崇拜。至造律台文化时期,已经开始种植小麦,种植技术逐步提高。渔猎和采集业较为发达,渔猎技术不断进步。饲养猪、狗等家畜,其中家猪形态特征与野猪进一步拉大。野生动物以鹿为主,少量牛、扬子鳄、鱼等。炊器多以鼎为主,空三足器开始出现。人们修建了少量城池,在铸造技术、排水设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精神生活丰富,奠基现象普遍,存在生殖和自然崇拜,占卜活动频繁。到了夏商时期,农业进一步发达,小麦种植的比重不断上升。饲养的动物除猪和狗,还包括牛、羊和鸡等。饮食器具发生一定的变化,受热性更好的空三足器、甗较为流行。

该书的独到或创新之处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厘清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基础上,对该区域文化遗存的分布区域、延续年代、地方特征进行综合研究,在文化分期、文化关系、聚落性质、建筑技术等方面提出一些新见解;二是梳理该区域墓葬材料,从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等角度分析该区域人的埋葬习俗的变化,并与居址分析的文化遗存对比,分析发现居址与墓葬的巨大差异;三是对该地区的手工业遗存进行研究,对同时段不同文化遗存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系统梳理,从衣食住行等角度分析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当然,书中也有不足之处。受材料所限,作者对有些问题的论述还略显薄弱,如豫东及相邻地区华夏与东夷两大民族集团关系的演变、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在聚落考古上,也有一些有待系统研究的地方,豫东地区的聚落分布、埋葬习俗、建筑方式、人地关系等方面需要全面综合探讨。

总体而言,《豫东地区史前夏商的社会变迁》是一部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术专著,填补了系统研究豫东地区史前夏商时期社会变迁的空白。该书的出版,对于了解、认识豫东地区史前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探讨商族的起源与夷、夏、商三族关系,复原史前夏商时期的社会变迁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因此,我乐于向学界和读者推荐之。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豫东地区史前夏商的社会变迁》

作者:赵俊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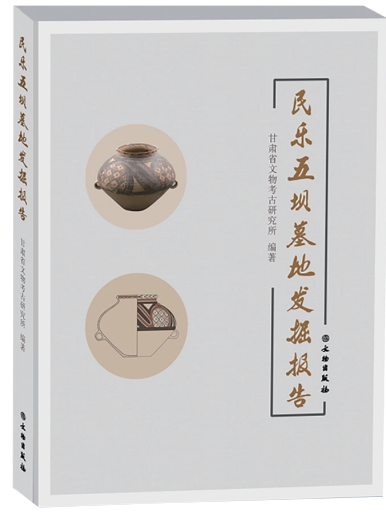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 龙山时代河西走廊的新标杆

## ——《民乐五坝墓地发掘报告》读后

任瑞波



彩陶,均进行了翔实的文字介绍和全面的图片展示。

最后,对遗存的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和细部特征进行全方位展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不论是田野考古发掘还是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追求“精细化”,对遗存粗线条或单一的展示已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对遗存细节或细部特征进行极致追求,最大程度地“榨取”历史信息,已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本书编写者显然已经关注到这一趋势,不论是对遗迹还是器物,在宏观整体和微观细节方面均给予充分呈现。墓葬整体照和局部细节照相互结合,器物正视图、侧面照、俯视图和特殊局部放大照相互配套,将遗存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二部分,发掘资料的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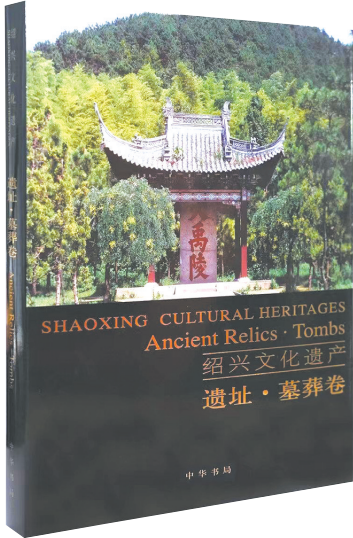
该书在第二部分进行了翔实的资料分析和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基本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如对墓葬的分期、年代和文化性质的讨论。二是专题研究,如对墓地布局、制陶工艺、制骨工艺、生计经济和史前东西文化交流的讨论。通过基础研究和专题研究,得出很多新的认识和结论,至少包括:第一,五坝墓地涵盖了半山文化、马厂文化、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其中,五坝墓地的发掘将半山类型的分布西界推进至民乐地区。第二,五坝墓地分早、中、晚三期,属半山文化晚期(距今4400—4250年)、马厂文化中晚期(距今4200—4000年)和西城驿文化(距今4000—3700年)。第三,五坝墓地早、中期墓葬有东西向埋葬的大趋势,头向东。晚期出现部分南、北向墓葬,头向南。第四,五坝墓地M44是甘青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竖穴偏洞室墓,马厂时期出现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竖穴双偏洞室墓。第五,五坝墓地的陶器制作、修整、装饰和修补具有流程化生产的特点,骨器喜用哺乳动物和大型鸟类肢骨。第六,五坝先民主要摄食C4粟、黍作物或以粟、黍为主食的动物,摄食了大量的动物蛋白质,且肉食量较高。

通过客观的公布材料和全面的研究讨论,该书将五坝墓地清晰、真实、深入地呈现在读

# 向后看,更是为了向前走

## ——读《绍兴文化遗产:遗址·墓葬卷》想到的

高军



与背景上的,它是尊重历史的实证。处在迪荡新城的“西施山遗址”,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基本建设中发现的,当年陆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青铜器及印纹陶,是绍兴作为越国都城为数不多的无可争议的实物遗存,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绍兴因城市扩容需要,地处西施山遗址的城东地块被列入新城开发区域,这就引出了西施山遗址的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选择共赢的方案,是摆在当时城市规划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显然,文物部门在当年规划城市的大潮中是一个弱势部门,但我们既要政府对政府的决策负责,也要对百姓和社会的关注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因此拿出专业信息提交给政府和社会,才是既参与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又维护了本行业的职业操守。今天回想当年与有关部门解说与交涉的艰辛过程,仍令人唏嘘感叹。但正是因为有了这

者面前。当然,一本优秀的发掘报告能将发掘材料全面客观介绍出来,其实已经完成了其重要使命。至于研究讨论的过程和观点,或将成为定论,供学界直接引用;或有待调整,供学界继续讨论;或引出新问题,供学界深入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专题研究讨论的结果虽然与研究者的方法和视角密切相关,但一定要以准确的基础研究为前提。因此,在此提出报告中基础研究可进一步讨论的三个问题。

问题一,部分典型陶器的类型学研究问题。发掘报告对墓葬出土的绝大多数典型陶器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为墓地的分期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五坝墓地出土了一种“凸棱纹”装饰的非彩陶双耳罐,这种双耳罐器既具有特殊性——仅见于河西地区,也具有普遍性——在五坝墓地很多墓葬中都能见到,而且数量多,器表装饰和具体形态也不完全一致。遗憾的是,发掘报告并未对这一典型的特殊器物进行分期定式。“凸棱纹”双耳罐在发掘报告类型学研究中的缺失,会对报告的分期结论和相关遗存的性质判定产生负面影响。

问题二,遗存性质和文化分布态势问题。整体而言,五坝墓地的主体属于马家窑文化系统,其中部分墓葬属于马厂文化和西城驿文化无疑,因为同类遗存分别在邻近的鸳鸯池墓地和潘家庄墓地均能见到。不过,以M44和M36为代表的墓葬,显然是这片墓葬的“搅局者”,M44发现了半山文化风格突出的黑红复彩锯齿纹,M36出土了齐家文化常见的侈口鼓腹绳纹罐,以二者为代表的墓葬究竟如何确定其文化性质,是看单一的典型陶器,还是看共存的器物组合,显然还有待进一步的学术讨论。表面上看,这只是某一座墓葬的文化性质归属问题,但涉及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如,单纯的半山文化到底有没有东进至以民和为代表的河西走廊中部一带,典型的齐家文化在河西地区以何种态势与马厂文化和西城驿文化共存,半山文化和西城驿文化中究竟有没有以“凸棱纹”为代表的典型双耳罐,西城驿文化究竟是河西地区马厂文化的哪一类遗存“过渡”而来,等等。

问题三,碳十四测年和年代判定问题。本书根据已有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五个测年数据,但是数据没有对应的墓号,这不能不说是的一大缺憾。造成缺憾的原因可能与遗址发掘年代和整理年代时间相隔较长有关,也与墓地发掘团队和报告整理团队人员变动较大相关。

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确定与否,关系着当前学界对龙山时代河西地区考古的最新认识和研判。由此可见,《民乐五坝墓地发掘报告》绝不只是一本包含53座墓葬的发掘报告,它为河西地区龙山时代考古确立了一个新标杆、竖立了一面新旗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民乐五坝墓地发掘报告》

编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样的碰撞,最后才有了西施山遗址核心区块保护的共识。将目前西施山遗址保护区块的规模跟迪荡新城相比,或许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点,但它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正是这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遗址保护地,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文物工作者守望者的职业情怀。今天,当现代都市崛起于古城文物遗址侧畔,依然留有城市文明源头的遗址保护地,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有力象征。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可以静静地聆听古与今的对话。

2011年秋,绍兴城东香山建设工地发现了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王陵,古墓椁底长达47.6米,底层铺设的长枋木口径达到0.6米,长达5米。在两千多年前,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建造这样规模宏大的陵墓实在令人惊叹。对于这样的历史遗存,文物部门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历史、客观、辩证的权威信息,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由物化遗存看到当时的政治制度、等级制度和人性尊严的差异。提供这样的信息,目的是让人们认识真实的历史,理解真实的历史,并为后来的历史观提供正确的依据。香山越国王陵考古发掘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虽然古墓已屡遭盗掘,没有更多的实物出土,但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真实的王室墓葬,它提供给我们的是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

我们不能为读历史而读历史,更不能沉浸于历史的回忆而沾沾自喜。后人了解历史,反思历史,但最后的目的是为了书写新的历史。文物部门就是一个为书写新的历史的人们提供尽可能丰富、完整、客观的历史资料的部门。由此说来,这个部门的责任是重大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单位: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